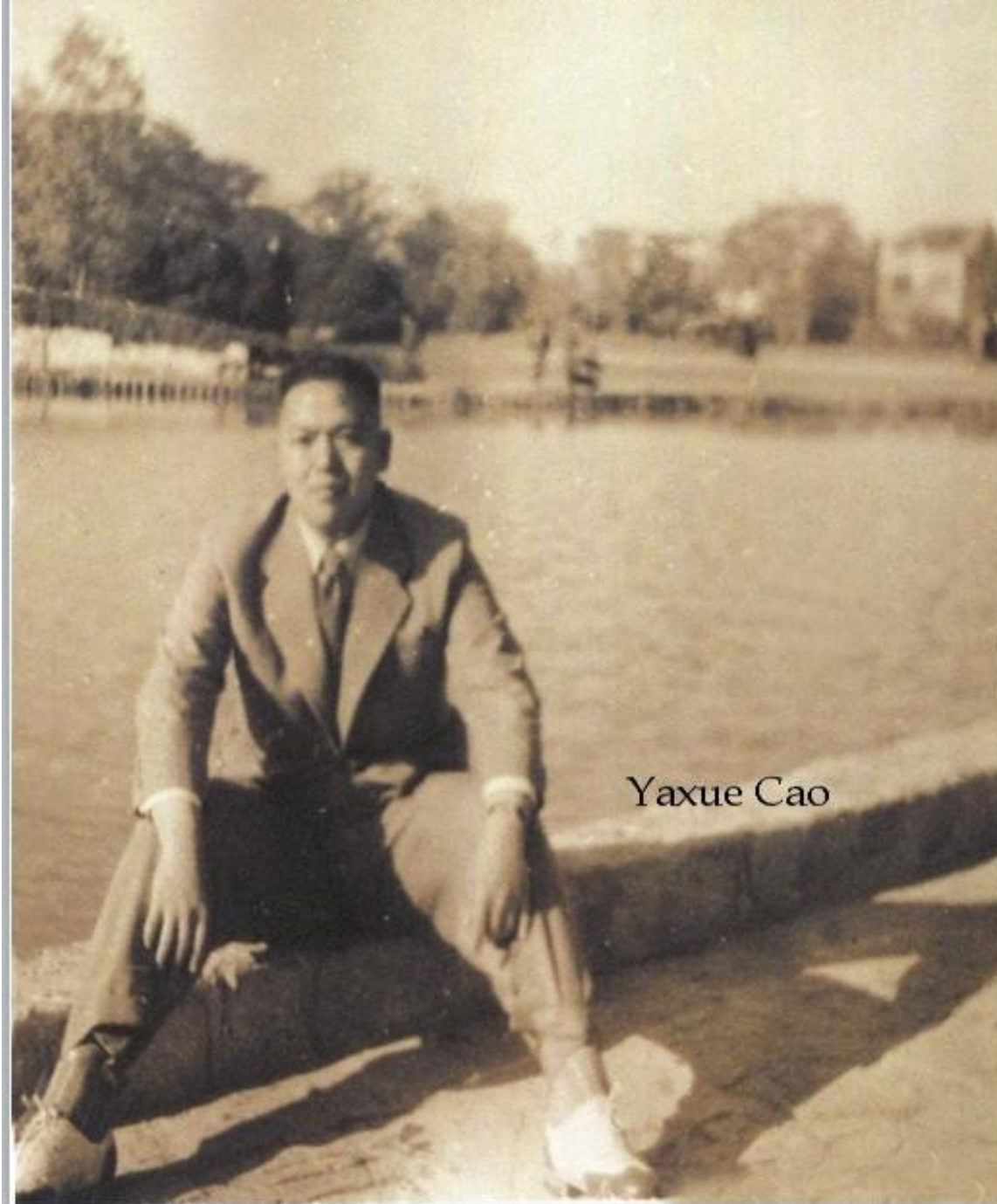


# Sheng Shuren

The Story of a Journalist in New China



Yaxue Cao

# 盛树人

曹雅学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读姨父刘尔宁去世后留下的文件时，看到了盛树人这个名字。从文件中，我知道他是 1958 年与尔宁姨父在河北徐水一道被逮捕的一个人。我很想知道他是谁，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世，我能否找到他给我讲讲发生在徐水的事。上网查，在宁波一所小学的名人校友介绍中找到了一个名叫盛树人的人。我知道就是他了：

“盛树人，字尹幸，骆驼镇西盛村人，1920 年出生，童年就读于钟毓学校，四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解放前在《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解放后入新华社，后在政治运动中被贬，直至 1979 年方获平反。可惜那时他刚去世不久。”

要找的线索已断，可是这几句话并未就此走开。它们给了我另外一个故事，沉甸甸地坠在心里。几个星期前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或者说有过---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却想知道他的故事。

再找，还是空手而归。失落中，看些能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是美国圣公会 19 世纪末在上海创办的一所大学。前身为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国语和上海方言授课。1896 年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时，是沪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

所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圣约翰大学 1913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 年开始招收女生，并发展成为一所拥有 5 个学院（原来的四所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 个系的综合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有“东方哈佛”之称。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创立于 1921 年，是亚洲第一个新闻系，采用美国最老的新闻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模式和教学方法。1950 年 12 月，圣约翰大学被责令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在 1952 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又与中国所有其他教会大学同时被解散，其院系并入沪上其他大学，其校址成为当时新成立的、隶属于司法部的华东政法学院校址。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名人数不胜数，仅我能认出的名字就有一长串，如林语堂、顾维钧、宋子文、鲁平、邹韬奋、史镛久、荣毅仁、严家淦、周有光、董乐山，等等。张爱玲在那里读过书，建筑家贝聿铭则毕业于它的附属预科学校。在另外一处，我看到一张圣约翰大学的建筑和校徽的照片。校徽上的中文校训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英文校训则简单地说，“Light & Truth”（光与真理）。

想来他是 40 年代伊始的毕业生吧。很容易想象一个儒雅的、身着西装的年轻人的样子，一种我们只从发黄的黑白照片上才见过的人。那样的人在我长大的中国，可以说已经绝迹了。不光是穿的衣服不一样了，就连脸上的表情、身体的姿态、说话的语汇和语调、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了。我闭上眼睛能够回想起来的天空一律是阴霾的灰色，人一律有着一双警惕、恐惧和怀疑的眼光。这当然不是记录意义上的事实：天不会天天都是阴天，也不是所有人或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但谁能说记忆的自然沉淀以及它因循自己的内在逻辑所进行的加工不具真实性，甚至比事实更加接近真实呢？“改造”是那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改造”无处不在：工业、农业、商业、城市、建筑、思想、语言，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时刻，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而一切的改造说到底都是对人的改造。到了我记事的时候，这场改造才进行了不过十来年，但已经彻底到那样的程度，不能不令人称奇。

前日与尔宁姨父的弟弟尔家通电话，我甚感惋惜地提到了盛树人的名字。

不料尔家说，“盛树人啊，我和他很熟！”

“你怎么会和他很熟呢？”我惊讶万分。

“啊呀，”尔家说，“咱跟他通了好多年信，还去过上海，住在他家！”

我更加意外了，赶紧请尔家详细道来。

原来，尔宁姨父和盛树人 1960 年底从徐水分别被遣返回原籍后，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宁姨父有时会让弟弟尔家代自己写信，“你替我给盛树人写封信。”但时间不长，天天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的尔宁姨父便失去了谈论任何话题的兴趣，两人通信渐疏。倒是在邮局上班的尔家继续着与盛树人的通信，后者总是在每封信的末尾“问尔宁好”。在粮食凭票供应的年代，上海能够便宜地买到全国粮票，尔家和盛树人保持了多年的粮票贸易：尔家寄钱到上海，盛树人在黑市上给尔家买粮票，这样一来一往，帮助缓解了刘家粮食不够吃的问题。63 年还是 64 年，盛树人要再婚了（前妻在他逮捕后离婚），给尔宁姨父寄来请帖。不过他没有去。1972 年夏，盛树人写信给尔家说，他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因为房子不属于任何单位，无人给修，自己修又买不到材料，请尔家在鞍山帮忙购置水管。需要多少根，每根多长，多少拐角，几个龙头，他在信里交代得清清楚楚。尔家在鞍山购置好二十多根一米来长的水管，捆成一捆，倒两次火车到了大连，在大连码头的长椅上睡了一晚，第二天顺利上船，到上海去送水管。之所以说“顺利”，是因为不是说去上海就可以去，用尔家的话说，“看你稍微不顺眼的，根本不让你登船。”那时的尔家，还不到三十岁，相貌清俊，穿着邮局绿色制服，定是非常“顺眼”（我乍见刘家七兄弟的旧照片时，心里暗暗赞叹尔家的英俊，即使 70 年代人那么单调的打扮也埋没不住）。船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上海，盛树人从码头把尔家连人带货接到家里后，两人到餐馆吃饭：两菜一汤，其中一菜是宫保肉丁。（我以为这是那年代北方的“通菜”，原来上海也不例外）。尔家到达上海的头一天晚上，上海工人联防上门来查户口，先是质问盛树人：家里来了人，为什么不报告？盛树人回答说，今天刚到，还没有来得及。然后工人联防对尔家进行了详细盘问：哪里来的？什么关系？到上海来干什么的？尔家老老实实地说来看病（那些年里尔家患有类风湿症），顺便来看看老朋友。联防可能觉得中国人民邮政的邮递员（尔家工作证上的描述）是自己人，没有过多纠缠，放过了他，临走的时候命盛树人第二天交来访客报告。尔家说，那时候他以为盛树人从徐水被遣返回上海就是正常人了，不知道他仍然是“专政对象”，家里有风吹草动或人员出入，联防便会来查。

我请尔家给我描述盛树人的样子，他说，“一米八大高个。爱笑。皮肤特别

好。大眼睛。待人好。”我又请他描述他的气质，尔家停顿了几下，好像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嗯啊了几声后，他说“人家呀，特别那个文雅”。说完了，似乎还不尽意，想了想，又补充道，“文质彬彬！”那时候的盛树人已经五十岁出头，离婚后分给他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人，一个在无线电厂，另一个在上山下乡。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回到上海后不得不寄居母亲家里的缘故，他和后娶的妻子各住各的。尔家前脚刚到上海，尔宁姨父的一封信便接踵而至。对尔家的上海行程以及与盛树人的相见，远在辽宁的尔宁姨父充满了激动的遐想。他为两人通信多年后的见面感到兴奋，说他们的“革命友谊...胜过世间最丰盛的宴席，使世间更加温暖，使人生值得爱恋。”对于“曾在徐水相伴、同遭诬陷并吞咽着苦难的”树人老兄，他说他相信“真理能把颠倒了的世界覆正。”比盛树人的长子只大几岁的尔家称他为“树人大哥”，盛树人则称尔家为“家弟”。树人大哥和家弟不开伙，在街道食堂吃饭。尔家最爱吃的小笼包三分钱一个，虎皮蛋五分钱一个，两个人实行AA制，十块钱吃半个月。盛树人的母亲住在他后面的一栋房子里，正在病中，两人一道去百货店给她租氧气袋（尔家离开后不久，她便去世了）。没有事的时候两个人一起逛街，在黄浦江畔溜达。树人大哥患有神经压迫症，走路慢，容易累，两人常在人民广场歇脚，聊天。这么多年后，尔家忘记了人民广场的名字，却记得树人大哥告诉他，那里原是上海的跑马厅。我是根据这个线索查出广场的名字的。树人大哥告诉家弟说，有人想出一千块钱买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凭，但他说，要是在香港卖，至少能卖到两千。他提到他曾经被怀疑是特务。他说，新华社的对外英语广播错误很多（显然他有在收听），他把听到的各种错误一一写下来，改正后，寄到新华社。尔家听了，不胜惊讶地看着树人大哥，觉得他太不可思议了：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竟然还惦记着新华社！再说，人家哪会听你的呢？

在树人大哥家住下，尔家受自家大哥之托，去看大哥在军队时的一个朋友。大哥的朋友坚决反对尔家住在他家。“那样的人不能接触！”他激动地喊道。尔家说，他不是跟我二哥一样吗？大哥的朋友决绝地说，“不一样！他跟你们不一样！”对如此武断和激烈的区分，尔家感到不可理喻，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他用“震惊”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他没有接受大哥朋友的好意，还是回到树人大哥家。盛树人靠教英语谋生。尔家在那里时，盛树人教着三个成年人，至少是高中学生。他们轮流来上课，一次一个半小时。盛树人还到学生家里教。有时候两人在外

面的时候，树人大哥会让尔家原地等他一个半小时，他到学生家上完课回来，他们再继续走。树人大哥跟家弟开玩笑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呆两年，就学会英语了。对于这样的提议，尔家禁不住嗤嗤发笑：英语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异物，他学英语这一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我告诉尔家，盛先生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教英语了。而且还有远道慕名而来的学生。我在网上查到一位姓钱的无锡人，1962年高中毕业后“遵父嘱赴沪师从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盛树人先生，学许国璋英语。”尔家盛赞盛树人的英语“真是太厉害了”。碰到不懂英语的人言之凿凿地评价他人的英语水平，我总是很尴尬。在尔家的情况，虽然他有充分的间接根据，但我还是赶紧给他补上证据：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全英文大学，盛先生还在上海两家当时最有声望的英文出版物做过事。尔家说盛树人健谈。我问他那两个月里他们都谈了什么，尔家却想不起来更多的东西。我问尔家盛树人是不是右派，尔家想了想说，不是，没听他说过，也没听我二哥（即尔宁姨父）说过。我问尔家，他有没有谈起过发生在徐水的事情。这一回尔家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从没有提过。他没提，尔家也没问。停顿了一会儿后尔家又说，那么不光彩的事，谁愿意提呢？

尔家来一次上海不容易，要代家人朋友买很多上海才有的好东西和辽宁稀缺的东西，从粮票、食品到日用品，单子很长。两人去买鞋，树人大哥给自己买了鞋，不等回家，在店里马上换上，让尔家感到人家上海人跟自己“很不一样”。那时候，自行车要凭票购买，但要有关系才能搞到票。上海是自行车产地，在市第一百货商店地下用眼神和暗示进行交易的黑市上，自行车票15元钱一张，尔家买了票，用此票在上海买了一辆自行车，运回鞍山，仍然比鞍山便宜。尔家快走的时候，两人早上去副食商场排队买带鱼。买带鱼限量不限次数，两人连续排队，买出来十斤，回家用盐腌好。尔家回辽宁时，大大小小一共带了十一个包，其中包括荤油一锅，面粉一袋，三五牌钟一个，咸带鱼十斤，衣服和鞋三包，上海大白兔软糖两包，以及更多。外加自行车一辆。树人大哥给家弟带回了两个上海城隍庙糕点礼盒；知道尔宁姨父爱喝茶，给尔宁姨父带了两盒茶叶。尔家走的那天，树人大哥到码头为他送行，嘱他有机会再来上海。从登船到开船，时间拖得很长，树人大哥站在码头上，一直等船走了，才转身迈着缓慢的步伐离开。

尔家忘了是76年还是77年，接到盛树人妻子一封信，告知他盛树人出车祸死了。尔家拿着那封信，哭了好几天。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从英国人办的一份报纸，从 1850 年创刊至 1951 年停刊，是中国历史最长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后改为 The China Weekly Review，但中文名未变）1917 年在上海创刊，1953 年停刊。关于这份英文政治刊物，在我查找和阅读的过程中，有这样几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是，埃德加·斯诺 1928 年来到中国时，就是从《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其记者生涯的。1936 年 11 月，这份刊物连续两期全文刊登斯诺从延安发回的文稿《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大幅刊登了那祯著名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二是，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密勒氏评论报》被查封。1941 年，主编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被日本人逮捕，受到严刑折磨，双足致残。三是，1945 年抗战胜利后，该刊曾发表社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与统一的中国”，同时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腐败进行揭露和谴责，被美国商界视为国统区内敢于直率批评政府的一家独立刊物。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密勒氏评论报》给自己制定的使命是不偏不倚地向美国民众提供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消息。“这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正确清楚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概念。”在这方面，刊物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如《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政党》，向读者介绍“新民主”和“联合政府”等概念。在 1952 年由《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出版的新西兰记者艾黎（Rewi Alley）的日记中，作者由衷地赞叹北京是“希望之城”，“对于成长在新时代的年轻男女们来说是一个天堂。”最后一点，该刊主编小鲍威尔（John W. Powell，鲍威尔的儿子）回到美国后，美国政府起诉了他、他的妻子和另一位编辑朱利安·舒曼（Julian Schuman），指控该刊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为“虚假陈述”（false statement）。这个案子 1959 年 1 月在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开庭审判，但法院因故宣布审判无效（mistrial）。同年 7 月，美国联邦政府作为原告，因无法从大陪审团（Grand Jury）取得“叛国罪”指控书（indictment）而放弃了对他们的叛国指控。1961 年，美国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同意撤销对这三人的其他起诉。此案前后历时五年。

用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与落后”标准以及“敌我”标准衡量，《密勒氏评论报》可以说“进步”得不得了，鲍威尔父子则早有“中国之友”之美誉。老鲍威尔被日本人折磨致残，可以与任何人民英雄比肩。关于这份刊物的停刊，我看到的一致说法

是，它因受到美国禁运而出现财政困难，不得不于 1953 年停刊。不知道鲍威尔知道不知道，但是包括小孩儿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即使没有财政问题，这份刊物—或任何独立刊物—都不可能继续在中国办下去了。到了 1961 鲍威尔案件在美国撤案的时候，他恐怕不知道，他所认识或一道工作的那一代中国新闻报人，包括曾在他的刊物供职的盛树人，恐怕差不多都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右倾主义分子”、“特务”、“反党分子”、“反革命”、“阶级敌人”和“叛徒”之一种，并且没有一个人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不要说公平审判。少数幸免的，到另一个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肯定被全数打尽。

圣诞节除夕早上，我和家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开车到北卡罗莱纳我公婆那里过节的时候，我收到了盛立人先生的电子邮件。我是在同一所宁波学校的网页上看到他的介绍的。他是盛树人小十七岁的弟弟，一位退休数学教授。在我从尔家那里意外听到盛树人的故事前，他似乎是我唯一可能找到的、能向我讲述的人，于是我给他写了封信，寄往他退休前执教的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我这样做，只是想试一下，并没有敢指望这封信会送到—也许他已经移居别处；即使送到了，他也不一定会答复：我在信中已经说明，我想写一下盛树人先生的故事，他会不会想讲过去的事情是一个问题；即使想讲，他会不会把哥哥的故事交给一个陌生人去讲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叙述是那样一件危险的事情，一件事情从这一头进入叙述者，等它从另一头出来时，它常常多么令人意外。这意外当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甚至惊喜的意外；但更经常地，从另一个人的话中吐纳出来，天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又怎样地可以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让人感到不对，心生拒绝。

他说他和老伴几个月前刚从华盛顿城外的马里兰州探亲回来，如果那时我们要见面的话，简直太方便了。但要是他人不在安徽，他说不定就不会收到我的信了。让我吃惊的是，他在信中说，我所说的逮捕与遣返在他哥哥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因托洛茨基派嫌疑而被新华社除名。他还说，家兄两次去新华社，家父都反对，但是家兄两次都未听劝阻，最后落到那样的田地，只能说是宿命。他说，家兄死在上海的街上，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是一双陌生的手为他阖上了眼睛。但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吧，他说，家兄生不如死，好上帝用一付车轮将他引达天庭。令我会心的是，盛先生也提到了“拒绝遗忘的责任，”虽然我在信里并没有这样说。即使



在我心里，这句话也还没有坚固起来。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是想讲一个人的故事。他的故事深深刺痛了我，令我不能释怀。信的结尾，盛先生说，第一次通信便写了这么多，情之所至，不能自己，请我原谅。我马上给他回了信，感谢他的回复，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处处装点着灯饰、空中回荡着圣诞歌声和烤火鸡的味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过节的日子。

圣诞节后我给盛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先从盛树人两进新华社说起。家兄大约是1942年左右大学毕业的，盛先生说，那时候我才是几岁的孩子，我还记得全家人出席毕业典礼的情景。他穿着学位袍，还抱着我照相。那时的上海是日伪时期，工作难找，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戈登路巡捕房担任翻译。后来他先后考入《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也许是在报馆薪资微薄的原因，盛先生说，他又考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这是他解放前的最后一个工作。那时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上海解放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共产党对他来说早已经不是陌生的东西。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共产党怀着深切的好感，另外，他在圣约翰大学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钱维藩在大同大学学习、后来成了水利部副部长的妹妹钱正英很早就是地下共产党员，我小时候，钱家兄妹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另外，家兄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很多国民党精英阶层，对他们的腐败十分厌恶。现在解放了，国家有了一个新政权，而他也终于能够从事他所喜欢的新闻工作了，所以他一心要到新华社去。家父心存保留，劝他不要去，他的朋友们则劝他到香港去。那时，上海英国领事馆已经搬迁到香港，如果他去，仍然可以保持在领事馆的职位。结果他严辞拒绝了所有人的建议。盛先生一直在用平稳的语调叙述着，这时一个强调落在“严辞”上，兀忽一下把它弹出了句子。我完全能够想象那个名叫盛树人的新闻记者的选择：现在有了统一的中国，有了一个他认为更好的政权，如果能够到自己国家最高级的新闻通讯社去工作，为什么要去英国领事馆当雇员呢？1950年，当盛树人携带妻子和二幼子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他对新华社的工作怀着怎样的憧憬、对自己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前景有何设想，我只能去想象了。从北京回来的消息是，他的工作是天天戴着耳麦收听西方国家的英语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然后打字打出来，再翻译出来，报送给中共领导人看。社长对他非常器重。我找到的资料说，新华社国际部是当时国内唯一收集国际消息的地方，

他们办的不公开信息汇编《参考资料》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各出一本，共十几万字，在固定的钟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在 1950 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我只知道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却不知道这中间还夹着一个“肃托”，即 1952 年 12 月 22 日晚上在全国各地同时进行的对所谓托派嫌疑分子的突然逮捕以及随后的囚禁。那天是斯大林生日，据说“肃托”是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如同共产党的一切肃清，肃托不仅是暴力性质的，同时也是株连式的。盛先生说，家兄受到托派特务分子嫌疑，是因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中可能有过自称为托派的学生，而他也许跟一两个这样的人同过学，甚至是朋友；另外，家兄解放前的工作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可以说，在党的眼里，他身上每一寸都是可疑的。他被逮捕后，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北京出生——回到了上海。对他的审查进行了一年多，盛先生说，这期间我母亲从上海到北京去看他，住在我大姐家里。母亲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先到新华社开了证明，大姐给她雇的人力三轮车把她送到了一所监狱门外。母亲出示来见儿子的证明，但没有获得允许。受到拒绝后，母亲坐在监狱门外没走，指望着再进去试运气。但坐了不一会儿，两个女管教人员出来，恶狠狠地把她轰走了。母亲回到女儿那里，说她坐在外面的时候听到里面传出来像是榔头碎石的声音，担心儿子在受重体力活的惩罚。这样一来她更加放心不下了，于是再次去看他。这一次还是不让见，母亲伤心地哭了起来。那两个女管教干部也许是发了善心吧，盛先生说，让他们母子见面了。母亲问他是否在里面干重体力活，我大哥赶紧说，没有，没有，我在里边看看书。（我从当年其他托派嫌疑人的回忆录中知道，他所说的看书，包括一本《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但是，盛先生说，到底有没有，我们也无法知道，因为管教干部站在一旁，他是不会敢说真话的。我说，是的，在看过了不少关于这种见面的回忆录后，我差不多能够想象他们母子那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沉默长话语短的见面，而单独的见面我还没有在看过的任何描述中见到过。一年多后，对盛树人的审查宣告结束，确定他不是托派，但他却被从新华社除名，也就是说，对他的特务怀疑并没有消除。回到上海后，盛先生说，他在一所中学找到一份教职，教语文。教语文？我很惊讶。是啊，你不晓得吗？盛先生说，那时候中国学校只教俄语，不教英语啊！我怎么不知道呢，但一时竟然忘了这个事实。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盛先生

说，是1956年吧，新华社又要他回去。这一次，家父坚决反对，劝他留在上海教书；他又不听，执意回到了新华社。过了两年，盛先生说，家里收到他从徐水写来的信，知道他又出事了。

我差点忘了。上海我其实是去过的。那是1990年春节，我临时决定到一个朋友家过年。年三十那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几个小时后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从飞机场，我打了一辆的士前往上海火车站。记得那是傍晚时分，天空阴霾，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空气凛冽得出乎一个北方人对上海的设想。不知为什么，我此刻想着六点钟这样一个确切的时间。现在上网点击两下便知，那段穿越上海城的路程有十六公里长，沿途有动物园、电影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的中山公园，以及曾经有过佑尼幹路（Jernigan Road）和亿定盘路（Edinburgh Road）那样名字的道路。但我要么是在出租车里打盹，要么目光空茫，漫游在弯弯曲曲的思绪中，因为就像梦境中的景物，除了一段灰色的墙壁，几幢形状模糊难描的房屋外，我的上海记忆一片虚诞。在火车站，我按照朋友告诉的车次买了票，登上火车，前往目的地合肥。在合肥，朋友的家在一所大学内，寒假期间，学生都走光了，校园像一座空城，在一场新雪的覆盖下，寂寥可闻。年后，走在合肥的街道上——那好像是我停留的五六天里唯一一次上街，虽然我从未来过这个城市或任何邻近的地方，但眼光所及，不管是街道、房屋和商店，还是人，还是冬天的秃露和雪后的泥泞，它显得非常熟悉：它跟我的家乡，或成千上万中国的城镇，毫无二致，它就是中国。89年后的第一个冬天在我的耳中像死一样寂静，推土机与工程车的轰鸣声还未到来，我在做着远走的准备。我虽然早知道我能走的路是有限的，但是在大学毕业后短短几年便被抵到墙根，却是我没有想到的。对于我要去的地方，我既不了解，因此也谈不上憧憬，它只是向我提供了一个可去的地方；而我心中唯一确定的是，无论去什么地方，只要能走，我必须走了。次年，我离开中国，来到了美国。

接下来，我和盛先生电话和电子邮件并用，又交谈了数次。我了解到，当他的哥哥在北京再次遭遇变故时，盛先生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书。在那里，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学子，把兴趣聚焦到了天体力学上。我请他用一句话为我这个外行解释一下什么是天体力学，他说，就是“研究三体（太阳、地球与月亮）运动问题的数学。”我说，我还是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数学，但我喜欢太阳、地球、月亮

和运动这几个字。他说，在此之上，更普遍的问题是“n体问题”，即预测相互发生重力作用的一组天体的运动。他说，这是一个三百年还未解决的问题，恐怕再过三百年也不一定有解，而他当年立下雄心要解决它，那真叫少年不知愁滋味啊。他自嘲地说，而我则被青年数学家上至天体的“狂妄”感染得心里鼓鼓的。盛先生在五七年反右中幸运躲过了劫数，但是，因为家庭的背景和大哥的“问题”，恐惧深刻而永久地进驻了他心里。他说，他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又会带来什么。他在大学是拔尖的学生，但毕业分配时也许是受哥哥的影响，他既没有能够留校，也没有被录取上研究生，而是分配到了位于合肥的安徽大学教书。我向盛先生讲述了1990年初那次在我的感觉中已经几近虚幻的旅程，它把我带到了上海和合肥这两个今天以这样的方式与我发生了联系的地方。从盛先生那里我不无惊奇地了解到，上海火车站离他家只有几站而已，只是那时，位于江西北路426弄的盛家已经人去屋空。在安徽大学数学系，他从纯数学中得到某种慰藉与安全感。文革后，八十年代初他考取出国，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de Strasbourg)从事了三年的学习和研究。他自豪地列举了几个我能认出来的名字：美学家朱光潜、语言学家王力、数学家吴文俊，还有歌德。我惊奇于盛先生懂法文这个事实，他说，他小时候在上海震旦附中、后来在沪上名校立达学园上学时学过法语，后来又常读法语数学文献。七十年代的头七年，他在长江边上的乡村下放时，他说他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他劳动过，被体育运动委员会借去当过篮球教练，当过贫宣队。他随身带着的有数学书，还有从外文书店里买来的、苏联人出版的法语小说原文。他坚持研习数学，还翻译过一些法国经典自娱，如《卡门》、《高龙巴》、《九三年》。《茶花女》他则翻了小说又翻剧本。他说他最喜欢的法国作家是梅里美。翻译法国文学显然给了他很大乐趣和满足，他笑呵呵地说，我翻译完了，还悄悄地给我的老同学看呢！我问到他的退休生活时，他告诉我说，读书，写书，打篮球。他说退休以来他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已经两次印刷，两次脱销；另一本叫做《选举几何学》，他希望很快能够出版。我开玩笑说，从书名看，您的兴趣好像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1956年盛树人重返新华社工作时，他只身一人前往北京。这一年他三十六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还是个新生儿。他的妻子本来就不想去北京，在北京短暂的两年多又那样收场，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了。这次回去，盛树人仍然从事外讯翻译。他的工作产品无从检索，我只在1957年的新华社月刊《新闻业务》上找到了他的三篇署名文章，其中两篇是译文，一篇是他写的短文。两篇译文译自俄文，一篇介绍苏联的“中央新闻工作者之家”，描述那里如何是“所有新闻工作者们创造性活动的场所”；另一篇描写在1956年10月23日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期间，“政治冒险家”们（几个段落之后他们变成了“匪徒们”，再几段后他们变成了“反革命集团”）如何武力占领新闻机构并取得报纸和杂志的控制权，以及在文章避而未提的苏联武力干涉后，匈牙利的报纸如何办得更加精美，更加吸引人，特别是，新闻自由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没有落入那些与人民与自由为敌的人手中。他的翻译语言畅通、精确，即使在修饰成份很多的时候也伸展得十分清晰。最能体现他个性的恐怕是他的语言中那种沉稳和不紧不慢的感觉。当我和盛先生提到盛树人的俄文翻译时，他很意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大哥懂得俄文。可是，他显然是懂俄文的。他的短文登在1957年第9期《新闻业务》上，我看到标题时心里惊跳了一下：《美国谣言和情报的大本营—美国新闻署》。前面那一截感觉生硬、刺眼、刺耳，像是硬贴上去的。在这篇数百字的文章中，除了“嚣张”、“造谣”那样的几个词从这里和那里戳出来外，他用同样清晰条理的语言和不紧不慢的语气，把美国新闻署从预算到设置到功能介绍了一下。到了结尾一句，又好像硬贴上去一样，口气与节奏突然一转，变成了我从小到大天天从报纸杂志上看到、令人抽缩的谩骂语言：“由此可见，美国新闻署乃是一个每年从美国人民手中抢夺一亿多美元用来进行造谣和收集情报的特务机关。”这样的话也许是他自己写的，也许是编辑加上去的。但不管怎样，在新华社，他必须学习用这样的语言说话。对他那样一个受西方人文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人来说，他所面临的改造，别的不说，单单是语言方面，恐怕已经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仅仅从这篇文章看，还米是米，水是水，还没有做成一锅饭。

在1957年的反右中，新华社总社一共产生了96名右派。盛树人不是其中的一个，这表明了他有一定的谨慎和自我保护意识。盛树人和尔宁姨父是1958年3月与新华社一批记者与工作人员到徐水劳动的。当时的徐水是全国闻名的共产主义

县，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北京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都分期分批到徐水参加这场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跃进。从关于徐水的诸多记载中我们知道，人们三班倒、一天二十四小时劳动，掘地七尺，密植作物，要创造亩产万斤的农业奇迹。全县大办工业，“一夜之间，每个公社和村庄都办起十上百个工厂。”至大炼钢铁运动兴起时，全县50万人，“家家建炉，人人炼钢。”此外，徐水“敢想敢干，誓把大学办”，一天之内成立了101所大学。徐水还有“写作运动委员会”，街头巷尾诗墙画海，画面上画着人蹬梯摘棉，粮仓高耸入云，一棵白菜上坐着四个人打扑克，一块红薯装一车。

如果这么多活动听着还不够忙不够累的话，那时还田间地头，天天开会学习和辩论。学习，谁都知道，学《人民日报》，学那上面的指示；辩论辨什么呢？谁对大跃进有怀疑，谁抵触或怠工，谁执行命令不力，就辩论谁。大家把要辩论的人围在中间，“像摇煤球一样推来揉去，只摇到头蒙眼黑，头吐白沫，磕头认错为止”。辩论果然有效，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刊登的徐水经验总结，“辩论前，1400民工14天只开渠300米；辩论后，1000民工3天就开渠500米。”那年七月份，来了一个向党交心活动，每个人必须交待自己在前一时期的整风与反右中的思想与行为。在此前的肃反运动中，尔宁姨父——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因为一些尚未成形的诗稿和小说稿已经受到审查，并被定性为“作品思想反动，本人思想落后”。向党交心的时候，他犹豫着是否应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害怕说心里话，“深知...后果将十分严重”；但他又不愿意向党隐瞒，“深感是对党不忠诚老实，是罪过”。于是他交心说，总社的结论“我还没有想通，但我愿意接受党的长期考验，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样交心后不出几日，在一个那时经常举行的万人大会上，尔宁姨父突然被逮捕。说突然，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逮捕，怎么霎那间便成了“反动分子”，便被开除了公职。和他一同逮捕的有三百多人之多，包括盛树人。现在我知道，那年六月份发布的徐水县政府公告规定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地、富、反、坏、右和落后群众这几类人实行劳动教养。而刚刚建立的三个劳教农场，用一位县领导的话说，“每个农场需要1000人，赶快速捕，往农场送。”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有四千多人在徐水被逮捕。

尔宁姨父和盛树人被逮捕后，被送到八一农场劳教。他们在农场的铁丝网内掘地、沤肥、搬石、做棉鞋的时候，铁丝网外面，徐水正空前热闹。前来视察和参观的人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从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到共和国元帅，从人民代表到政协委员，从科学家、文学家到外国友邦使节和新闻记者，走马灯一样，令徐水县委应接不暇。来的人，无不惊叹徐水“红花开遍，顿显新貌”的奇观。《人民日报》盛情抒发道，“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1958年8月毛泽东在离尔宁姨父和盛树人劳改的农场不过几里地的地方视察徐水时，听了亩产万斤的汇报后，不知是忽生忧虑，还是出于抑制不住欣快，问旁边陪同的地方官员，“那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啊？”陪同的地方官员只想到要放高产卫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语塞。他老人家自己回答说，粮食多了终归是好的，国家不要，别人也不要（因为到处都亩产千斤万斤），那就“社员们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不是一天吃三顿还是吃五顿的问题，而是一场持续数年、导致数以百万计人死亡、钦定教科书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全国大饥荒。徐水1959年便开始出现了饥荒，人民纷纷开始逃离，外出求生，政府在各个路口设置关卡，阻止他们离开。1960年底八一农场解散，面如菜色、身体浮肿的尔宁姨父和盛树人分别被遣返原籍。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这时候，尔宁和我姨已经离婚，两个男人拿着一张已经写好、已经注明日期的离婚书，来到刘尔宁和我姨位于北京黄亭子的家中，看着我姨在上面签了字，声明她与反动分子刘尔宁离婚并划清界限。这是我出生前的事；我从来没见过尔宁姨父。

宁波盛家是大户人家，有老盛家和新盛家之分。盛先生家是老盛家，世代地主，祖居由十个院子组成，所谓“九进十庭”。最后的一个院子最大，有两个篮球场大，是专门供祖宗牌位的地方。盛先生说，小时候回宁波，他最喜欢在那里玩，因为那里院子大，能跑，而他的姐姐们却害怕得不敢去。盛先生的母亲也是宁波人，娘家是开酿酒作坊的。他的大姐和大哥都在宁波出生。后来他们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做得很成功，先是在上海天厨味精厂做今天我们所说的销售经理，一年到头下南洋或越洋至美国旧金山推销产品。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充

裕，在法租界有自己的房子，盛先生的姐姐和哥哥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自己也是在那里出生的。三十年代，他父亲开了一家火油厂，工厂有自己的驳船，在吴淞口与工厂之间运输货物。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工厂被炸，驳船被日本人拿走，父亲顿时破产，不得不变卖房产，一家人靠积蓄过日子。日本投降后，驳船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父亲四处托人，送“活动费”，希望能把这唯一的财产找回来。钱花了不少，驳船却到了也没能找回；共产党接管上海后，索性连船的影子都不见了。宁波那边，土改的时候，房子和土地都被分了。解放后，父亲到香港工作了几年，后来身体不好，五十年代末回到上海家人身边。

1961年2月，已经在安徽大学教书的盛先生寒假回上海过年时，见到了从徐水回来不久的大哥。他说，家兄看上去状态还不错。乍一听，我甚感意外；但再一想，就明白了：他刚刚从劳动了一年多的农场回到家人身边；另外，一个有能力的壮年男人不难、也完全有理由保持一些希望。过完年，盛树人到北京去办最后的手续，这包括转户口，以及到组织部门签一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开除证明。证明已经撰写好，并有了日期；尽管他从来没有“供认不讳”，但是他没有再做任何辩驳。回来途中，他取道合肥，去看看安徽大学的样子。盛先生试图给大哥在安徽大学英文专业找个工。他们很需要人，对盛树人很感兴趣。那时候饥荒已经来临，兄弟俩人在学校吃不饱饭，不得不到外面价格高许多倍的“高级饭馆”吃饭。过了好一些日子，盛先生还没听到回音，去找，对方什么解释也没有，只告诉他说不行。盛树人这次被遣返回上海的时候，公安局不给上户口，他落为黑户。盛先生说，他这种情况在上海叫做“口袋户口”。有户口的人，每月粮食供应是28斤；他也有供应，但少3斤。不久，他的妻子跟她离了婚，每人管两个孩子。盛先生说，离婚后，前妻仍然尽力照顾分给他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把他们结婚时盛家送的首饰都还给了他，帮助他度日。但是，盛先生说，那时候国家的黄金收购价只有一两一百零三元，而且只能卖不能买，你要是拿着一百零三元，是无法买来一两黄金的。盛先生说，那时候家兄只能靠教英语挣点钱，而且只能偷偷摸摸地教，要是让人知道了，那又不得了了。盛树人的大女儿考大学，成绩考得很好，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没有被录取。盛先生说，她来找我，问我该怎么办，我教她在学校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听从党的分配。我的希望是，她这样高调表态，也



许能获得学校的同情，但是没有人对这个孩子动恻隐之心。后来盛先生托人，在云南给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六十年代中，上海外语学院有一个出国部，经好朋友钱维藩介绍，盛树人在那里教了一段时间的英语。那时的希望是，这样教下去，过一段时间，也许他可以转为正式职工。但是教了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出国部取消，他失去了那份临时教职。文革期间，也许因为他没有工作单位，所以没有受到揪斗。但是有一年，盛先生说，我正好暑假在家，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我和我的大侄儿找了三、四天，才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他。原来，他去黑市时被一个裹着脚的老太太告发，文攻武卫把他抓走了，一关关了二、三十多天才放回来。那时候的上海，谁都知道黑市，谁都使用黑市，但只有他这样的人一不小心，才会被告发。那些年他就是这样过来的，盛先生说，教点英语挣几个钱，两个大孩子工作后，接济他一点，母亲有时候也塞给他一点。盛先生说，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艰苦，我月薪 50 多元，几个姐姐的情况也不好，都还要赡养父母，也没有能够帮上他。你读过泰戈尔吗？盛先生问我。我说，只知道名字，好像读过几页《飞鸟集》，但都忘了。盛先生说，家兄从北京回来后，就成了泰戈尔说的“贱民”，the untouchable. 你明白吗？

我是在尔宁姨父提到盛树人名字的同句话里看到他的罪名的：调戏妇女。这也是尔家告诉我他认识盛树人后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尔家在电话那头陡然失调，“啊！”

“在徐水劳动的时候白天黑夜，不是很忙很累吗？我二哥说，盛树人急着撒尿，站在地头撒尿的时候被一个女的看见，这么就‘调戏妇女’了！”尔家的声音窜高了一阶，混合着讪笑、痛和抗议。“我二哥说，他们指责他调戏妇女的时候，连看见他撒尿的那个妇女听了都笑了，你说那是‘调戏妇女’吗？我二哥说，简直是践踏常识！太不讲理了！但是他们想把你抓起来就把你抓起来，你就得忍受！”

我想到“不光彩”这个词。耻辱好像另是一种活物，不管其来源如何，属不属实，有无正义，却会自行活下去，并像影子一样一直跟着你。就连尔家也会下意识地用这样一个词。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他的大哥因为和自己的恋人拉手而坐牢，家人到现在都绝口不提他的这个“污点”。

这就是那个名叫盛树人的人的故事。



(1965年前后在上海一所外语学校教书时。)

(封面：盛树人 1948 年携家人回宁波老家时的照片。)